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文化运动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一、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1915 年盛夏，闷热的天气几乎使人们透不过气来。

5 月 9 日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签定中国与日本之间关于南满、东蒙、山东的“条约”和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的“换文”（即二十一条）以来，各地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议集会、抵制日货运动，在大总统袁世凯的严令敦促下遭到镇压。不久，报纸上又登出政府聘请的宪法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鼓吹中国宜实行君主制的言论。紧跟着，那位因写了《君宪救国论》而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联络总统府顾问孙毓筠、国学大师刘师培等发起组织“筹安会”，以筹划“一国之治安”为名，发表鼓吹帝制文章，掀起关于国体问题的争论，并且配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府要员，四处组织请愿团。一时间，帝制风潮沸沸扬扬，政治空气的热度不断上升。筹安君子们热得发昏，一心想黄袍加身的袁大总统烧得发昏，而那些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志士、知识分子则气得发昏！

这一天，坐落在上海棋盘街上的群益书社门口，一辆黄包车刚刚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位三十六、七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长方的脸庞，前额饱满，眉骨略凸出，两道粗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射出犀利的目光。他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陈独秀。

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1879 年生于安徽怀宁（即现在的安庆）。因家乡附近有一坐独秀山挺拔屹立，后来他写文章时一度使用“独秀”、“独秀山民”的笔名，久而久之，“独秀”反而成为人们熟知的名字了。

陈独秀小时候聪明、顽皮、倔强，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又同情弱者。有时因不服管教遭到祖父严厉的责打，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不止一次愤怒地骂他：“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强烈感受到了大清王朝的衰败不堪，以及列强势力威逼压迫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屈辱。他奋起投入反清斗争，办报纸，结交名士，组织革命团体，联络同志进行活动，并数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有时不得不流亡国外。

辛亥革命以后，陈独秀目睹了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派人刺杀民主斗士宋教仁，废除《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步步走向独裁，而多数国民浑然不知不觉，甚至附和专制、拥护复辟的现实，感到忧心如焚。

1914 年 11 月，他在日本协助著名政论家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指出真正的爱国应该认识国家的目的和形势，爱人民的国家、民主的国家，而不应该盲目地以忠君思想去“爱”滥用国家威权，残民误国的“恶政府”。文章中悲愤过激的语言遭到不少人的非议。为此，他想办一份杂志，进一步宣传他的“自觉心”思想。他找到主持亚东图书馆的同乡好友汪孟邹，请求资助。汪虽然与他是莫逆之交，但苦于财力不足，难以承担杂志的印刷与发行，于是向陈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知道陈独秀即是 10 年前驰名全国的《安徽俗话报》的创办人和主笔“三爱”先生，当即拍板，同意为陈每月支出编辑费 200 元，出版一期刊物。刊物的名称定为《青年杂志》。后来因上海青年会向群

益书社提出《青年杂志》与该会出版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有冒名之嫌，陈子寿与陈独秀相商，于 1916 年 9 月发刊第二卷时起，将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备受屈辱。一开始，人们以为中国只是武器、运输工具和工商业比西方国家落后，因此开办军械厂、船政局，制作洋枪、洋炮、火轮、舰艇，又开办民用企业，以及铁路、航运、电报局等通讯交通事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挨打的局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开始认识到，单靠“器物”的更新还不足以救国，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是导致国家衰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幻想依靠有开明思想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阻挠破坏，落了一个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康、梁亡命国外的结局。其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政治。

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富强。国家政权落入野心家手中。短短几年之间，“中华民国”就成了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这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才进一步认识到：国家政治的进步仅靠政治本身的变革也还是不行的。政治的更新有赖于国民思想觉悟的提高，而国民思想是与千百年来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影响分不开的。要改变国民思想，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要建立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必须使国民具备近代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陈独秀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创办《新青年》杂志的。

《青年杂志》之所以以“青年”命名，是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好似初春、朝阳，好像刚刚开放的花朵，如果把社会比作人体的话，青年就是新鲜活泼的细胞。他希望青年“自觉奋斗”。“自觉”就是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责任，自强自尊；“奋斗”就是要发挥各人的智慧和能力，同陈腐落后的人物与思想作坚决斗争，决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决不受其影响。他在《青年杂志》第 1 号开篇《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青年应具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思想和行为品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说的是人应当有平等自主权利，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善恶；一切思想、信仰、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思考，决不盲从别人、依赖别人，当别人的奴隶，也决不让别人当自己的奴隶。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说的是人应当跟上宇宙发展、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求新，接受先进的事物。认识到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风俗已落后于时代，失去存在的价值。不应当让这些落后的“国粹”束缚自己。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说的是人应当勇于进取冒险，在艰难的环境下抗争，战胜恶社会，而不被恶社会所征服，切勿为洁身自好而忍让退缩。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说的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已渐成互相之间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生当此时的青年应丢掉闭关锁国的思想，了解世界，掌握

各国知识。否则个人将落于时代，国家也将无法在世界上立足。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说的是应接受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实利主义”、“实验哲学”，以“利用厚生”为人类生活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现实生活问题，抛弃同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表面文章和道德说教。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指出科学是空想的对立物，是消除迷信、根治无知的武器，是推进社会发展、知识进步的重要因素。近世欧洲之所以进步，“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中国人民若想脱离蒙昧和浅陋，“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即应把科学放到与人权同等的地位来看待。

以上六条即是陈独秀对青年提出的希望，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理想中新的时代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人民所应具备的新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和第六条，也就是“人权”与科学。这里的人权主要是指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属于民主思想范畴，或说民主精神、民主原则。它与民主政治观念密切相关，所以后来也被归结为民主思想。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首要内容，《新青年》杂志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是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的。

民主和科学又被称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两面大旗。

启蒙运动原本是指 18 世纪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的时代,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而发起思想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能够凭借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自己的幸福。他们提倡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乃至无神论、唯物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启蒙”的英文 Enlight，带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因此，也可以说启蒙就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启封建专制、保守落后意识之蒙。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波及到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俄国等许多国家，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为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排除了思想障碍，并且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后来启蒙运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普遍称谓。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上承了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启蒙宣传，以传播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进步思想为手段，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文学、艺术、思想观念发起了猛烈攻击，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正是 20 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则是这场伟大运动的揭幕人和领导者。

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

在清末民初北京城地安门内的马神庙（即现在的景山东街）一带，有几十栋新旧相间的房舍，这里是京师大学堂校址。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 1898 年。它最初是承继清朝国子监的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1912 年 5 月，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学者、翻译家严复被任命为该校的第一任校长。

1916 年的北京大学经严复和另外几位继任校长的努力，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全校有文、理、法、农和预科学生 1500 多名，有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开设国文、伦理、中国史、外语、西洋史、法制、经济、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画图等多门课程。这年 6 月，学校从比利时仪品公司借款 20 万元，在原有的操场动工兴建一幢有 300 多间房屋的校舍。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红楼”，亦即北大第一院所在地。但由于受到社会上和校内不良风气的影响，学生中不少人求学的目标是毕业后升官发财，或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好职业。有的托门路、找靠山，有的游手好闲，不用心学习，考试打小抄。教师中有的思想陈旧，大肆宣扬复古读经，有的只是混碗饭，平时不事研究，上课敷衍了事，也有的道德堕落，赌博、当嫖客。这种情况直到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才得以改变。

蔡元培（1868—1940 年），字鹤卿，号孑民，是辛亥革命期间有影响的领导者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1892 年他 24 岁时考中进士，随即进翰林院，点庶吉士，两年后做编修。

清朝的翰林院是掌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注”，给皇帝讲解经史，及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的机构。每当新科进士产生后，其中文学书法较优秀者被选入翰林院所设庶常馆继续学习，称庶吉士。庶吉士经 2—3 年的学习，再参加考试，成绩优异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配到各部门担任主事等职务。蔡元培 26 岁授编修，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但他没有沉醉于个人对未来美好的幻想，而是深深为危机日深的国家和民族担忧。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断然弃官离职，返回浙江绍兴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他与好友发起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事务长（即会长）。又创立爱国学社，被推为总理。1904 年，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他又被推为会长。光复会后来和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等团体合并成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

1898 年，31 岁的蔡元培为了阅读外文书籍，拜师学习日语。第二年又开始学习英语。以后他多次游学日本、德、法等国家，翻译、编译了不少日文、西文书籍。他翻译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和他编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成为许多学校选用的教材。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民国教育总长。在短短 6 个月的任期里，他对民国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意见。如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等等。他还把清朝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修改为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五项内容的新教育宗旨。并且用中国传统道德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时代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积极的内容可以和现代西方进步思想中的科学、民主内容融合在一起，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原则，为新时代的中国国民吸收和运用。这一点构成了他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思想的基础。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他首先提出：大学的宗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遵照这一宗旨，他对学校的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授方法、教师的录用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领导成立了进德会，加强师生和道德修养。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学府。

蔡元培在改革中提出了一项重要思想。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应依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不同主张同时并存，以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他依此原则聘请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其中既有留学欧美的西化学者，也有拖着长辫子的国学先生；既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健将，也有反对革新、宣传复古尊君的保守人物。当然，录用的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具有学术专长。在思想方面，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以至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都被允许介绍和研究。此外，蔡元培还鼓励并支持师生建立各种学术性、社会性团体，创办刊物，参加指导社会的活动。这就为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最初由他一个人编辑，大部分稿子也由他一个撰写。虽然他在当时已颇有名气，他的文章气势磅礴，观点清新，但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每期杂志只印 1000 多份，其中不少用作赠送、交换，购买者并不多。为此，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赔了本，一度曾打算取消和陈独秀的合同。

1917 年 1 月，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文学院长。《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由上海搬至北京皇宫东侧北池子箭杆胡同 9 号陈独秀的住所进行。此后不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7 年 9 月，胡适应陈独秀、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授。1918 年 1 月，李大钊由章士钊介绍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他的弟弟，在北大做文科教授的周作人也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领导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1918 年 1 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编辑部的人员自己写稿。后来又采用轮流编辑的办法。从此以后，杂志内容更为丰富，销路渐广。到五四运动发生前后，每期销售量竟达到一万五、六千份。购买、阅读《新青年》的除北京大学师生外，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南京等地许多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和社会青年。不久，在陈独秀等人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这些青年从《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中，从他们敬仰的先生们的授课与交谈中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并很快成为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更为积极、热心的宣传者。

1918 年 10 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同时，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孟寿椿等发起组织了国民社。国民社的成员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青年学生和一些留日、

留美归国学生，共 180 多人。这两个社团的刊物《新潮》、《国民》均于 1919 年初创刊。在此前后创办的刊物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主编的《每周评论》、北大教授朱希祖、陈启修等编辑的《北京大学月刊》，以及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五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新教育》月刊。这些刊物和《新青年》一样，刊载有大量的宣传新文化内容的文章。此外，上海《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北京《晨报》副刊、《京报》等也先后转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由初起时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了浩翰江河，其范围和声势都大大地扩展了。

1919 年 3 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批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走出学校，前往市区、工厂、农村进行讲演。他们的讲演内容丰富，题目众多，有“家庭制度”、“人生之要素”、“什么是我”、“迷信”、“国民应尽之责任”、“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等等。不仅宣传了新文化，而且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准备和动员。

五四运动中和五四运动后，以北大在校学生、毕业生及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山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青年学生为骨干的社团和他们创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新民学会，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都是其中颇有影响的社团。

《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新中国》、《新群》、《曙光》、《少年中国》、《建设》、《觉悟》、《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则是这一时期众多新刊物的代表。为了扩大新文化的影响，新青年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争相编辑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许多出版机构也开始出版大量的新文化图书。这些出版机关自行编辑的期刊杂志，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陆续进行改革，刊载越来越多的宣传新文化的文章。至此，新文化的宣传己成为全国范围内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三、打倒孔家店

孔子名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据说他搜集整理了周代典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将其作为教授学生的经典，并且提出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死后约 100 余年，孟子出世。孟子名轲，是孔子之孙子思门人的学生。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的言论被学生整理成《孟子》一书，同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论语》，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一同流传后世。孟子被认为是孔子的嫡传后人，因此，后代人就把孔子和孟子的学说称为“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在孔子、孟子的时代，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西汉年间，汉武帝采纳了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的主要依据。孔子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以至于被戴上“大成至圣先师”等桂冠。儒家思想经历代学者的总结、改造，成了维护封建皇权统治、保护封建社会秩序、规范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

遵循这套原则，各朝代的皇帝表面上以仁义道德自勉，要求臣民百姓向其尽忠。社会上形成了一套尊卑等级制度，各人依照名份循规蹈矩，违反者在道德上被认为是非礼，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非法。学生读书以儒家经书为主要教材，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文人学士以知书达礼为尊荣，以通晓儒家经典为学问高深。普通百姓中间流行着被通俗化了的儒家训诫，《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等成为少年儿童的启蒙教科书。这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里，从皇帝、官僚到普通的平民百姓，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孔孟的价值原则、行为规条便深深浸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封建思想特征的国民性格的中国人。

流传的儒家经典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是应重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应把皇帝一人一家的利益置于人民和国家之上。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要求人们做有志向，讲气节的“大丈夫。”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遇事不要凭主观臆断，不要走极端，不要固步自封不求进取，不要自以为是，听不得他人意见。还有儒家讲孝敬父母、尊师敬友、讲究信誉等。这些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性意义。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强化了儒家思想为其剥削压迫制度服务的一面。其中突出的就是从儒学“礼”的内容中阐发出一套“三纲”学说。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是指拉网的绳子，这里引申为主体、首领。君为臣纲是说君为主，臣为辅，君是臣的首领，是指挥臣的，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忠于君。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不平等意味着为君为父为夫者可以为所欲为，为臣为子为妻者不能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它不但造成了社会与家庭中明显的等级差别，而且使为臣为子为妻者养成不能独立思考，惟有依赖他人、服从他人的习惯。这种状况既不符合近、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要求，同时也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限制了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因此，对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

建思想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就对儒家思想展开了批判。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天下的男女都为臣、为子、为妻，整个社会便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他又说：“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贫贱”的阶级制度的。这是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的证明。因此，要想在政治上采取共和民主制度，在伦理上就必须铲除“纲常”学说。

和陈独秀相配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子平议》一文，从分析孔子学说如何被统治者利用和为什么能被利用的角度，批评了孔子学说中的一些缺点。易白沙指出：孔子不过是历代统治者的傀儡，抬高孔子以垄断天下思想，维护皇帝的专制，就是两千年来尊孔的秘密所在。

《新青年》批评儒家思想，驳斥尊孔主张在当时既是为了除掉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同时也是对提倡尊孔复古者的有力反击。

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影响，民国成立后，虽然皇帝被打倒了，鼓吹尊孔的却仍大有人在，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认为，民国初年政局混乱是“纪纲尽废，法典皆无”造成的；要想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必须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他把儒学称为孔教，并和他以往的学生及志同道合者一起建立了孔教会，办杂志、发表文章、召开会议，宣传尊孔读经、孔教救国的主张。他们的活动起到了为袁世凯实行专制和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死后不久，康有为再次给新任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写信，请求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拜圣”之礼。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接连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批驳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和宗教相混淆的作法。进一步申明，孔子学说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独尊孔子将造成学术思想上的专制；孔子之道与共和宪法相抵触，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孔子思想不能给国民带来幸福，不但不应该定其为国教，写入宪法，反而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李大钊发表文章说，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宪法是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孔子是国民中一部分孔子之徒的“圣人”，宪法是中华民国国民全体“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孔子之道是“含混无界之辞”，宪法条文字字确切而有“极强的效力”。如此看来，孔子与宪法不但毫无关系，而且孔子之道与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有什么理由把孔教列入宪法呢？

有一位四川籍的老学者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集中批判了孔孟关于“孝”的说教。他说，孝的范围是无所不包的，因此孝成为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与家庭制度连接的“根干”。孝和忠是相联系的，讲忠孝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地听从封建统治者的愚弄；孝与礼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家族基础是国家的基础，在家讲孝，出外守礼，这样就完全剥夺了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他列举了历史上讲究孝道的例子：有的把亲生儿子活埋；有的割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医病；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纳妾成为正

当；有的则认为女孩不能承继“香火”，生下后即将其溺死；而婚姻之事更只成了传宗接代的形式……。吴虞的这些分析有理有据，且言辞激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胡适说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以其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批判孔家店的运动。他写了一篇名叫《狂人日记》的小说，通过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反抗迫害的“狂人”的自白，对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本质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小说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揭露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朝每代都捧着儒家经典，标榜孔孟的仁义道德，但是有多少无辜男女惨死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淫威之下或封建道德的软刀子下，有多少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在纲常礼教的束缚下被扼杀。那种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的是“吃人”，那种不许别人、不许自己的后代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动辄挥舞礼教大棒，叫人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成的，也是“吃人”。鲁迅悲哀地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呼吁不要让那些没有受封建礼教影响，或利用礼教来束缚、迫害人的青年人再受礼教的毒害了。

《狂人日记》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当时与其后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吴虞在当时就评论说：《狂人日记》把礼教“吃人的内容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打倒孔家店不只是要掀掉孔庙中孔圣人的牌位，更主要的是要在国民心目中铲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近代以来对纲常礼教的批判并不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如为戊戌变法断头流血的谭嗣同在他生前写的《仁学》一书中，就对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但是从整体上对儒家思想进行批驳，对其各方面内容及其如何束缚思想、压抑个性等问题进行逐一深入剖析，并形成社会范围的批判思潮却应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有人把这一时期批判孔家店的运动称为整体的、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应指出：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也有非儒家、反儒家的非正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只是前者。至于后者，包括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有过较大影响的墨家思想，以及历代出现的反礼教、反专制的“异端”思想、民主思想等，不但没有受到攻击，反而为人们批判传统、认同现代民主观念所借用。

第二，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集中于其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纲常礼教思想。启蒙学者注意把孔子同后来形成的纲常思想分开，肯定孔子在他那一时代所创学说自有其时代价值和合理性。李大钊说，孔子生于专制时代，不能不就当时制度立说，如果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历代君主尊孔祀孔，已使孔子失去个人存在的意义，而成为保护专制的偶象，“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另一方面，对于儒家思想中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启蒙学者们仍坚持采用。如孔子学生曾参的语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被作为警句印

在《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在批判“儒崇礼让”的同时，也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语与世界各国名人名言勉励青年们“自觉奋斗”。

不管怎样说，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它为民主科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对后来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提起文学革命，不能不说到胡适。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 年生于上海。4 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与守寡的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的督责下，他自小努力读书。1910 年考取官费留学资格，先后入美国依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清朝末年，受到革新潮流影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提倡诗界革命、小说创作，出现了白话文报纸。当时还在上海读书的胡适也与同学合办了《竞业旬报》，学写白话小说和文章。在美国留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他在一首赠友人梅光迪的诗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郜（音“告”，为周朝一小国名。在此处比喻小看自己。），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

陈独秀与胡适是同乡，又曾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时读过他的文章，所以在创办《新青年》之后不久，即通过汪孟邹同胡适联系，请胡适为《新青年》撰文。

1917 年 1 月，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针对文学改良问题提出八条意见：“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照胡适的解释，“言之有物”是说，做文章要有情感和思想。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思想包括见地、认识和理解能力、理想三个方面，是文学的头脑。“不摹仿古人”是说文学应体现出当代的风格，不必把古代文学放到师尊地位，亦步亦趋地模仿。真正体现文学自身价值的是那些“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作品。“讲求文法”是说作文、作诗应当讲究语法结构，以避免语言逻辑不通的现象。“不作无病之呻吟”，是针对其时不少青年由于悲观伤感而常作发牢骚、感喟哀叹，甚至沉迷酒色、丧气失意诗文的现象，要求创作振奋人心、鼓舞志气的作品。“务去烂调套语”是说写诗作文应当用自己的话写亲身所见或经历的事，只要能状物写意，不失真实就行，不要使用套语套话。“典”指的是诗文中所用的包含有历史故事的词语，又叫典故。“不用典”就是说不使用那些与诗文描写的意思不相符合，或叫人读了难懂的典故。“对仗”是指旧诗文中按照字音的平仄、字义的虚实做成的对偶语句。这类语句在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和律诗中运用得最为广泛。骈文追求词句整齐对偶，重视声韵和谐、词藻华丽，结果导致做诗文者往往过多考虑词句的工整、华丽，而妨碍了内容的完整。“不讲对仗”即要求做诗文，不必过于看重词句的对仗技巧。“不避俗语俗字”是说应抛弃前人作文作诗避免使用民间通用词语的作法，采用白话写作。

以上八事可以归结为两个意思：一是文学改良应提倡用自己的话写现实生活中的事，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二是用普通的白话，写大家都看得懂的诗文。这也就是后来胡适说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在当时描写色情、披露隐秘等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胡适的这些意见是一种颇有见地的文学主张。对此陈独秀在他的《文学

革命论》一文中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胡适是文学革命中“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实际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通篇未敢提“革命”二字。还是陈独秀以战斗者姿态，在随后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高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亮出了他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所说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通指汉代以来盛行的用来阿谀奉承权贵、代传圣贤古训、注重文辞修饰堆砌的诗、词、歌、赋；山林文学是指离群隐居的所谓名士闭门造车，写出的大多数人看不懂的诗词之类。他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关注的是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和个人名利地位，脱离社会和普通人生，不但毫无价值，而且与旧政治、旧道德相联系，“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必须予以推倒，建设描写社会现实、国民生活，能够推动中国文明进步的新文学。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好比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新文化阵营内的钱玄同、刘半农等纷纷投入批判旧文学、旧艺术的战斗。

钱玄同，号为“疑古”，是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文字学教授。他在对旧文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两个惊人的口号：

一是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指的是文选派。“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的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的简称。该书中多刻意模仿古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的骈文。文选派即是推崇《文选》，追求骈体风格的文学派别。“桐城谬种”即桐城派，是指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姚鼐为代表形成的主张“文以载道”，推重散文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派别虽然对文体写作的风格要求不一致，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陈独秀所谓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之列。钱玄同称其为“妖孽”、“谬种”，把它们作为批判旧文学的具体目标。

二是废除汉字。

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历来记载或发挥孔子学说、“道教妖言”，因此，“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汉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过激言辞，反映了新文化宣传者对封建传统的义愤，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有一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倾向。

为了使文学革命的宣传引起社会的注意，钱玄同和刘半农还合演了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致编者的信，攻击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攻击白话文、新式标点，为桐城派、文选派辩护。刘半农则写了《复王敬轩书》，以嘻笑怒骂的犀利手笔，淋漓痛快地驳斥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

文学革命包括破与立两个内容，以及文学形式的革命和文学内容的革命两个方面。

文学形式的革命核心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也是它的主要方面。从这个角度又可以说文学革命是一场白话文运动。

古代中国由于文化教育远不普及，只有占全国人口一小部分的读书人有

接触文字的机会。一方面，普通百姓说白话，却读不懂文字；另一方面，百姓说的白话登不了文学的大雅之堂。文化的发展，文学语言水平的提高，没有解决文字和语言之间的矛盾，反而愈发造成了二者的分离。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新文化平等自由观念的传播，不符合民主国家的要求。同时它也阻碍了文学本身的发展。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鲜明提出以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后来他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

“国语”是当时人们提出的一个语言文字改革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教育部组织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以研究可以通用全国的语言为宗旨。胡适认为：“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是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而创造国语的文学，要以白话为工具，也就是用白话写诗、写文章、写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就是国语。等到白话文学发达之后，人人都从小说、文章中学会文学的白话，也就有了文学的国语。这个“文学的国语”相当于有了语言规范的、为全国采用的白话。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新文化宣传者一致的主张。同时钱玄同认为，通行的文字竖写竖排方式对于读中文、外文间插的文章很不方便，而且阅读时从左向右横视比自上而下竖视省力，自左向右书写也比从上往下、从右往左方便。于是，他主张仿照西文采取横写横排方式。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还就标点、汉字虚词的用法等进行了广泛讨论。1919 年 11 月，他们和北大另几位教授向教育部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议案》。

此外，《新青年》同人还对汉字改革和罗马字、世界语的采用等进行了讨论。

1918 年 1 月，《新青年》杂志正式改用白话文写作、新式标点排印。据说，杂志出版时，一些人见了哈哈大笑，以为怪物。但一年多后，大量新刊物都采用了白话文、新式标点，并用横排。在此期间，钱玄同、沈尹默等参与了创编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工作。不久，教育部下令将小学教材改用国语。1920 年，胡适用白话文写作的诗集《尝试集》出版。白话文很快取代了文言文，成为通行文体。这是文学革命的巨大成果。

在文学内容的改革方面，文学革命的宣传者们提倡打破“文以载道”的信条。“文以载道”是唐代著名古文学家韩愈提出来的。它要求学者写文作诗应以宣传儒家伦理道德为目的。这一主张为后来很多人推崇。陈独秀指出，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是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的门面语而已。他和胡适等人提倡以社会生活，包括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农民、小商贩、家庭、婚姻、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等，作取材来源和创作内容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然而真正对新文学内容进行较深入探讨和在新文学创作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自 1918 年起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把新的文体形式和反映社会现实，控诉封建礼教及专制政治压抑个性、残害人性的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为新文学创作树立了榜样。他在同一时期写作的随感录成为早期杂文的最佳之作，为杂文这一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周作人是鲁迅的胞弟，留学日本，对西方和日本的文学作品及理论较为熟悉。他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两个口号。

人的文学提倡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按周作人所说，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与儒教、道教非人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其实也是陈独秀宣传的人权自由主义。以这种人道主义为核心，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就叫做“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反对贵族文学立意，强调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后来，周作人把这些主张概括为“为人生”的文学。

1920 年周作人参加了郑振铎、沈雁冰、孙伏园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他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成为该会成员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有很多是“五四”以后活跃于文坛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同五四时期另一个由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发起的文学团体，同样用白话文创作但提倡浪漫主义文学的创造社成员一起，成为建立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

五、宣传“个性解放”

打倒孔家店，批判旧伦理、旧道德、旧文学、旧艺术是为了破除旧文化对于人们的束缚，使人们的心灵、思想得到解放。陈独秀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换句话说，解放就是使人摆脱奴隶的地位，获得平等的权利，成为自主自由的个人。这种“解放”也叫做“个性解放”。

为了宣传“个性解放”，1918 年 6 月，《新青年》刊出了“易卜生号”。

易卜生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挪威著名的剧作家，一生中写了不少揭露社会黑暗，宣传个性自由的作品。《新青年》译载了他的两部著名话剧《娜拉》（A Doll’s House，直译为“玩偶之家”）和《国民之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

《娜拉》写了一位天真纯洁的女青年娜拉嫁给了一个叫郝尔茂的男子，组成了一个家庭。郝尔茂很爱娜拉，但不尊重她的人格。他称呼妻子为“小宝贝”、“小鸟”、“小松鼠儿”，是觉得这些名字好玩。他给妻子买好衣服穿，叫妻子打扮得漂亮，是为了满足自已的愉悦心和虚荣心。娜拉一开始以为有了丈夫的爱就有了幸福，而她的责任就是使丈夫欢喜。有一次为救丈夫的生命，她冒名在借款单上签字，触犯了法律。丈夫不仅不愿意出面解释事情的原委，为妻子分担责任，反而骂娜拉败坏了他的名誉。等到事情和平了结之后，他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表示不再追究娜拉的过失，并且不知羞耻的说：“一个男子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的事。”最后，娜拉终于看透丈夫自私丑恶的灵魂，明白自己不过是丈夫寻开心的玩偶，于是下决心出走，离开了家。

《国民之敌》写的是一个名叫斯铎曼的医生建议修一个浴池。浴池修好后，很多外地人也前来洗浴、避暑和养病，渐渐使本地商业发达，市场兴旺。不久，在洗浴的人中出现一种流行病。斯铎曼医生检查后，发现此病和浴池的水有关。于是他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请求浴池的董事会改造浴池水管，以清除污染。因为改造水管要花一大笔钱，改造期间浴池停业会减少收入，并影响本地商业，所以当地所有人都反对改造浴池的提议。斯铎曼医生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把报告书送到报馆请求刊登，但遭到拒绝。他打算自己找印刷局印刷，也被回绝。他要开会演说，但没有人借给他房间。最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可是参加会议的人不但不听从他的意见，反而把他赶下台，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布他是国民的公敌。此后，地方政府革去了他官医的职务，本地商民发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房东叫他赶快搬走，连他在学校当教师的女儿也被辞退了。

这两部话剧揭示了家庭与社会压制个性的现实。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家庭里面有四大罪恶，“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就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代表。娜拉则是丈夫的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她思想……”为什么作女子的能够忍受那种作为他人玩物的不堪局面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作戏，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娜拉最后走出家庭，说明她觉悟了，不再装假面了，也有了胆子了。

但有多少与她命运相同的女子还不觉悟，还在装腔作戏，还没有走出家庭的勇气。

胡适又说，社会与个人是相对立的，“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但最后不是被社会的大熔炉所熔化，便像斯铎曼医生那样碰得头破血流，成为社会之敌。然而社会的生机和进步正是靠斯铎曼医生这样的敢于坚持正义，说老实话，与传统习惯、迷信、错误的“公论”进行斗争的人才能获得。这种人是世上最孤立的人，也是最强有力的人。他们对于社会好比人体内杀灭病菌、维护健康的白血球。他们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

胡适认为，要使社会上像斯铎曼那样的人增多，就要鼓励个性发展。个性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有自由意志；二是要肯于对社会负责。如同易卜生所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在整个世界如同船坠落下去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他主义。”

胡适的这种分析从较为深入的层面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宣传的内容，同时也触及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法律、习俗及家庭制度压抑个性的某些方面。

封建时代的中国盛行一种家族制度。一户人家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繁衍生息，渐渐形成一个大的家族。同一家族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共奉一个祖宗，有自己的祖坟、宗祠、族谱、家训家规。在家族内部，族长和家长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决定子弟的生活方式、职业选择、婚姻大事等等。家族、家庭内的成员，特别是妇女很少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此都有切身感受。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的女生李超就是封建家族制度和传统观念的牺牲者。

李超是广西人，父母早亡，跟着继母长大。因为没有兄弟，她的一位叔伯哥哥被过继到她家，准备承继李家的产业。她的家庭较为富有，因此她自小受了一些教育，长大后想继续求学。但她的哥哥既担心她读书浪费钱财，又因家乡没有女子外出读书，怕惹人耻笑，同时给李超说媒的人也不断登门，于是他想早点打发李超出嫁。李超不愿意过早嫁人，坚持到北京求学，结果遭到家人和亲属的非议。家中不给她寄钱，以至她负债。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她患病，后来竟死在医院中。

李超惨死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不少进步同学的同情。1919 年 11 月 30 日，北京学界在女子高等师范举行了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到会者有 1000 多人，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很多社会名流学者参加了大会并作了讲演。追悼会收到挽联千余幅。其中蔡元培的挽联写道：

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

守财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

胡适搜集了李超生前的一些信件，破天荒为这个普通的女学生作了一份传记。他在这份《李超传》中，除叙述了李超的简历外，以大量的篇幅引述了李超与家人的通信，揭露了旧家庭的黑暗、高压的婚姻、恫吓的手段、不合理的男子继承制度、家长族长的专制。他认为李超的遭遇是“无量数中国

女子的写照”、“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应该把它作为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和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

女子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所谓“贞操论”。

按照封建礼教传统，妇女应遵守“三从四德”。“三从”说的是幼从父兄，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即是说妇女要有顺从丈夫，为夫守节的道德，要讲得体的语言，要有得体的衣着打扮，要会做纺织、缝纫等家务活。女子死了丈夫不仅要为其戴孝，而且要为其守节，即不再嫁别人。妇女以死殉夫，称为“烈妇”；未婚妻为已亡未婚夫守节称为“贞女”。这种节、烈、贞的行为不仅受到道德舆论的表扬，而且国家法律规定予以褒奖。1918 年 7 月 23 日北京《中华新报》登出的《会葬唐烈妇记》就是宣传这种节烈观的文章。文章写了一个姓唐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决心殉夫，先后多次服毒，投河，绝食，最终死亡。还记了一位已许配张家的俞姓 19 岁女子，还未过门，未婚夫突然死亡。此女知道后绝食 7 天以求一死。在家人的努力劝说下，她才暂时打消死的念头，说：我既然已是张家人，情愿为张家服丧 3 年，然后再去地下寻找亡夫。文章的作者对唐、俞二女的表现大加赞赏。针对于此，胡适与鲁迅相继写了《贞操问题》和《我的节烈观》等文。

胡适指出：守节和殉烈都是无道理的风俗。男女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婚姻的一方因故死去，另一方出于爱情原因不愿意再嫁是合情理的事，但中国男女婚姻大多不是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本无理由守节。至于道德舆论和法律表彰节烈更无道理，因为寡妇再嫁本是一个个人问题，与社会无关。表彰节烈等于鼓励人做烈女，这是故意杀人。另一方面，贞操应是男女双方的事，男子要求女子守贞守节，自己却可嫖妓纳妾，“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鲁迅在文章中讽刺道：“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他呼吁要除去这些“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由个性解放问题引出家庭制度、女子贞操、婚姻恋爱、男女平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制度、旧道德，宣传人权、平等、自由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当时各类报刊杂志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改造家族制度、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妇女解放、个性解放成为响亮的口号，这对人们特别是青年思想观念的转变产生很大影响。许多青年，包括女青年以娜拉为榜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为改造社会以及后来参加革命的重要力量。

六、新旧思潮、东西文化之争

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是位曾留学英国，遍游德、法、意、奥，懂得多种语言的学者。但他政治态度保守，笃信孔子学说，提倡“尊王”、“尊孔”，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先后在国外出版过德文著作《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和英文著作《春秋大义》等，受到一些人的重视。日本《东亚之光》杂志就刊登过赞扬辜氏思想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评断》。而这篇文章又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编者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材料。

1918 年上半年，《东方杂志》相继刊登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署名伧父）等人的文章《迷乱之现代人心》、《功利主义与学术》。文章认为：盲目输入西方学说，导致国家基本政治道德原则丧失、精神破产、政治专制、教育堕落；过于重视功利主义妨碍了学术独立，造成通俗主义、平凡主义受推重，高雅文化遭受蹂躏，领袖人才绝迹，盲从欧美之风盛行。文章作者在论证中引述了《东方杂志》所述德国人对辜鸿铭观点的赞赏，主张“统整”中国固有文明，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中。这些意见带有明显的批评新文化运动之意。陈独秀立刻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陈独秀首先针对杜亚泉等的观点提出 16 个问题请对方回答，随后指出：《东方杂志》记者征引辜鸿铭的观点，说明引辜为自己的同志；反功利主义等于赞成“罪害主义”；说普及教育为害学术，无异于反对教育普及；反对西方文化，又主张输入西方文化是自相矛盾。总之，西方政治与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绝非一物”，《东方杂志》记者以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来救国，只能导致抛弃民主、拥护专制！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争论方兴未艾，旧阵营里又杀出了一员老将林纾。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是对外文一窍不通的著名翻译家。他凭着一手好古文，通过别人口述，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等西方 10 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近 180 部，为西方文学输入国内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到了五四时期，他以遗老自居，顽固地反对新文化运动。

1919 年 3 月，他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信，指责北京大学有人哗众取宠，“覆孔孟、铲伦常”；讽刺文学革命说：若把古书全部废除，大家都用土语为文字，那么街道上“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都是好文章，京津一带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当教授了。

同一时期，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

《荆生》写了三个人物田必美、金心异、狄莫聚谈于北京陶然亭。田指责孔子，狄主张白话。忽然来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三人大骂一顿。田想抗辩，被荆用两个指头按住头，痛如锥刺。荆生又一脚踏住狄莫，差点把他的腰踩断。金心异则吓得连连磕头。荆生笑着对三个人说：你们几个狂生怪物，逆天理背人伦的肮脏禽兽，赶快滚下山去，别脏了我的剑。三人没敢多言，赶紧收拾东西逃下山去。

《妖梦》写了一所白话学堂校长叫元绪公（元绪意为乌龟），教务长叫田恒，副教务长叫秦二世（秦朝二世皇帝叫胡亥）。秦、田二人提倡白话，反对伦常道德，元绪公点头赞成。最后来了一个妖魔把三人一块吞噬。

林纾小说的人物、场景分别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和北京

大学，叫人一看便知。小说中手法恶劣，语言恶毒更令人难以容忍。于是，《晨报》、《每周评论》、《国民公报》等 10 余种报刊登载了有关新旧思潮争论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人批评林纾的做法是压制自由，还有的揭露林纾运动议员威胁教育总长撤消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一事。

蔡元培也公开发表了《复答林琴南》书，驳斥了林纾的责难，重申了他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

林纾的发难反映了社会上守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对此，陈独秀早有思想准备。他 1919 年初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曾表示：新青年发行 3 年以来，社会上大惊小怪，八面非难，把它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无非是因为它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但是，它“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的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因此他和同人们对林纾的攻击谩骂处之泰然，他们只是希望那些守旧派站出来，光明磊落地与新派辩论，不要采用依靠权势，抱“伟丈夫的大腿”，或造谣中伤的无聊手法。

新思潮与旧思潮激战的实质是要不要批判旧道德、旧文学，建立新道德、新文学的问题。旧思想的代表非难新文化人物对孔子和儒家道德的攻击，林纾表示要拼其残年，极力卫道。新思想的代表则认为纲常礼教和矫揉造作，代传圣训的旧文学不仅不适合现代社会，而且有害于国家和人生；主张输入西方文化以代替旧文化，建设新文学以代替旧文学。因此新旧思潮的冲突又是与东西文化，亦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争论密切相关的。

相互对垒的《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两个擂主陈独秀和杜亚泉就持有不同的文化观。

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本原，中国文化以儒家三纲之说为本原。西方文化重斗争进取，使其民族处于征服地位，中国文化重忍让、保守，使其民族处于被征服地位；西方文化重个人，以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为目标，中国文化重家族，损坏个人自由，养成依赖性，造成社会恶果；西方文化重法治、实利，表面上人人计较互不相让，实际上各守界限，互不侵犯，中国文化重感情、虚文，表面上互谅互让彬彬有礼，实际上勾心斗角，彼此为仇。总之，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进步，中国若想更新，应输入西方文化以代替传统文化。

杜亚泉认为，西方文化重人为，强调人的努力，中国文化体天意，讲究顺应自然。西方人向外求生活，重联络经营，中国人向内求生活，重安分守己；西方人有权利义务观念，但个人、国家、阶级、民族各种主义常常冲突，中国人无权利义务观念，但从个人到家族、亲友、乡党、国家、人类、万物形成差等，互无冲突；西方社会重胜利，以和平“构造战争”，成无时不战局面，中国社会重道德，以战争求和平，成一治一乱的形态；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带城市复杂生活色彩，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带乡村恬淡生活色彩。动的文明生活日益丰裕，但以身心忙碌为代价，静的文明生活日益贫困，但以身心安闲作补偿。总之，东西方文明性质不同，各有所长。中国文明在道德上优于西方。西方文明在科学手段、力行精神方面胜于东方。因此，救中

国的方法是“统整”中国固有文明，同时输入西方学说，以中国文明的绳索“一以贯之”。这不仅是救中国之道，也是救世界之道。

五四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章士钊提出了新旧文化调和论。章认为：宇宙进化是移行的，不是超越的。新旧时代连绵相承，不可能划出明确分界。大凡社会变化之时，总是旧因素与新因素杂糅并存，而旧为新的根基。“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以此为依据，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学问中有用的东西，应加以保存和疏导；对于西洋道德，既不要排斥，也不应存欧化心理，认为它一定可以运用于中国。

1921 年 10 月，一位因考试不合格未被大学录取、却被蔡元培破格聘请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的、年仅 28 岁的青年人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梁漱溟提出了所谓“三种路向”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种不同形式，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西方文化取向前奋斗的态度；中国文化采取随遇而安，调和持中的态度；印度文化采取“消灭问题”的禁欲态度。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屋子低小、阴暗、漏雨。一个西方人会设法另找个大的房屋，或把小屋子拆掉盖一个新的；一个中国人就不会设想换间大房子，而是将就在这个小而破的房子里生活，并且会觉得这个小房子也有小房子的好处，别有一番乐趣在其中；一个印度人不仅不会想到换房子，而且对房子的好与坏，在里面住有没有乐趣毫不关心。这就是三种文化态度在生活中的三种不同表现。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虽有失败的地方，但却是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因此，中国人应完全排斥印度的态度，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章士钊的调和论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却和杜亚泉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都反对新文化提倡者的推翻传统，引进西方文化的态度。这几个人和当时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被称作东方文化派。他们的主张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文化争论。这场争论吸引了相当多的关心文化问题的人参加。在争论中，赞成西化者有之，赞成调和者有之，赞成东方文化者亦有之。但即使是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人也不反对从西方文化中吸收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于民主、科学观念，参与争论者无不将其视为中国社会之必需。这是因为，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民主与科学在引导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北京东城沙滩大街路北（现五四大街西端）有一座全部由红砖建筑的四层大楼。这是北京大学 1918 年落成的第一院校舍，又称红楼。北大图书馆就设在红楼一层。在这里，人们常常见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身穿灰袍黑褂，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两撇浓黑的胡须，使人看上去想不到他的年龄还不到 30 岁。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

李大钊 1889 年出生于河北乐亭。他是个遗腹子，出生后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 70 多岁的老祖父。这位老人读过书，得过“从九品”的官衔，跑过买卖，很有些见识。在他的悉心引导下，李大钊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很早便树立了为再建中国献身的志向。

1913 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主编《甲寅》月刊、宣传民主思想的章士钊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1916 年初，他因参加反袁活动，耽误功课被校方除名。回国后，经章士钊介绍，于 1918 年 1 月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早在 1916 年 9 月，李大钊就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一篇著名文章《青春》，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的网罗，摆脱陈腐学说的束缚，“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创造文明，为人类创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文章热情奔放，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其时，他还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等世界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的生平与思想，并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变革；批判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或将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和暴力思想。到北大后，李大钊正式加入了《新青年》同人行列。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不久后，李大钊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革命的性质与 18 世纪法国革命的性质不同。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带有世界革命的色彩。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因在战争结束前夕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虽然是“宣而未战”，却也得到战胜国的殊荣。从 28 日起，政府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招待晚会，学生放假 3 天，和民众一道举行庆祝大会、讲演大会和提灯会。

在举国庆贺协约国战胜的欢呼声中，李大钊却提出：这次大战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及 1918 年的德奥革命所流的血，好比诺阿（《圣经》中的远古人物）以后最大的洪水。它将洗出一个新纪元：生产组织将有绝大变动，劳工阶级将联合起来，打倒全世界资本阶级。“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引起了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19 年夏天，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6 卷 5 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一号和 6 卷 6 号连载发表。

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他的名字和主张早在上个世经末（1899

年）就以中文译文形式在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上出现。后来，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等都介绍过马克思的主张。但他们的介绍还很简单，他们本人也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前夕曾加入中国社会党，在日本期间又接触过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安部矶雄，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使他成为国内较早的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意义和新文化同人中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根据日本学者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和内容。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论式”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独立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历史论——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资本主义经济论、政策论——社会主义运动论密切关联的三个部分（即后人所说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而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李大钊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将导致旧社会组织的破坏和新社会组织诞生的原理。后来他利用这些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解释了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成为中国第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人。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极大促进了国外各种进步思想的输入。自 1916 年起，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陆续传到国内，在中国思想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流行开来。同时，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演变。

在“五四”以前，甚至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期，民主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种国家的形式，因此被翻译成“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后来，随着新文化运动把人权、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宣传，也随着各种新思潮的输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民主不只是包含政治内容，也包含经济、教育、文学、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内容，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原则的代名词。于是出现了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文化的德谟克拉西、教育的德谟克拉西、社会的德谟克拉西等等说法。由此又进一步出现了平民教育、平民文学、平民经济、平民自治、平民道德等新名词。许多人转而把民主翻译为“平民主义”，把它看成是平等的主义，平民大众的主义。

上述种种思想观念使五四新文化思潮中社会主义的内容迅速增加。加上人们因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流血惨剧而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疑虑，再加上巴黎和会上列强默认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刺激，五四运动以后，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主义宣传日益广泛。

1919 年到 1920 年间，有两位知名的外国学者来中国访问讲学。

这二人一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一位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他们的思想都具有 20 世纪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有着反封建文化的意义。由于前者是著名新派人物胡适、蒋梦麟的老师，后者则是由标榜新派思想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所邀请，因此他们的思想在他们到处讲演传播的同时，更由他们的中国弟子和支持者加以发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胡适 1919 年初以《实验主义》为题介绍了杜威的思想。他所讲的实验主

义有三个要点：第一，注重解决问题的实验过程，即提出问题、找出方法、解决问题、验证结果的过程；第二，注重实验的效果；第三，强调在实验的每一环节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思想能力。这种理论用于社会实践，表现为反对从整体上改造社会，主张一点一滴改良，一分一毫进步。

同年 7 月，胡适写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空谈主义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容易被无耻政客所利用。他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提出的救济方法。中国的问题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活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等，都有待于人们去解决。这可以说是他运用实验主义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主张。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因为与陈独秀关系密切，被列入激进者名单。为了躲避警察跟踪，他一度回家乡避风。在家中，他读到了胡适的文章。他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胡适随即把李的信登在由他编辑的《每周评论》第 35 号上，并加上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李大钊在这封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提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离的，二者应同时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办法的效力在俄国已经得到了证明。这说明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而阶级斗争则是实现经济革命的工具。

李大钊与胡适的争论反映了在改造中国的问题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还是用实验主义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冲突。新文化阵营从此开始分裂了。

张东荪和梁启超 1919 年 9 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到内地讲演以后，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应该是发展实业和教育。他反对宣传劳农主义，认为中国过于贫穷，很多人从来还没过过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当时中国的发展有两种趋势：一是“绅商阶级”的形成；二是爆发伪劳农革命。他认为，宣传劳农主义，只能造成伪劳农革命。而绅商阶级的发展则可以吸收劳动力，增强富力，提高知识，并可取代军阀，使中国避免内乱。这些主张显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遭到了陈独秀和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评。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被迫辞去北大职务。1920 年他回到上海，和从日本归来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和李达指出，在中国开发实业有两种办法可以选择，一是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张东荪和梁启超把社会主义推到遥远的将来，只讲发展实业，支持绅商势力，其结果只能导致资本主义。中国的状况虽与欧美不同，但已到了产业革命时期。况且各国资本主义都要崩溃，中国没有理由保留它。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达还针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等思想进行了批判，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共产主义社会应建立在提高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思想。

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和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了目标，坚定了信心。自 1920 年起，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结出的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之果。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此期间《共

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发起新文化运动，并始终在运动中起着先锋和指导作用的《新青年》月刊，1920 年 9 月迁回上海，从 8 卷 1 号起脱离群益书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2 年 7 月出至 9 卷 6 号终刊。同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近了尾声。然而，这场运动所开辟的新的文化阵地仍在不断扩大，新的思想潮流仍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